

政治转型进程、公共安全及军队

作者: Sabine Kurtenbach

北非及缅甸当前的发展,显示出政府推行政治开放,会引发不安定状态,也许甚至会引起暴力活动。由于国家安全力量自身也处于极大的调整适应压力之中,处理发生的这类问题,颇为棘手。

解析

尤其在独裁体系过渡到民主体系的这一阶段,人们探讨暴力及政治转型进程二者之间的关系。政府发生改变的时候,国家安全力量也同时陷入到极大的改革压力之中。这一阶段面临的关键挑战就是,如何采取不会危及政治转型的手段,来制约暴力。

- 政治转型进程之中,获取国家权力和资源方面的现行游戏规则,发生了改变。因此,尤其须重新定义平民精英及军事精英之间的关系。
- 转型方式、国家机构的能量大小、外界干预,都影响着公共安全领域的问题局面,对制约暴力的可能性造成影响。
- 民主化旨在对军队、警察进行民主控制,并在安全问题方面采取法制国家的解决方式。但是,对安全领域进行改革,至少在短期或者中期内,将会减少国家对暴力制约方面的能力。
- 如何处理安全领域方面的问题,对政治转型的进一步走向,起着决定性影响。即使成功实现了民主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安全力量有可能长期采取高压手段。

关键词: 转型、内部安全、暴力、军队

现在，“阿拉伯之春”诸国的安全问题，威胁着这些国家的转型进程（参见：Mattes 2013），无独有偶，缅甸的暴力冲突，也威胁着当地转型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政治背景因素的暴力冲突爆发，以及犯罪暴力现象的上漲，都为国家安全力量带来了更多问题。人们要求，政治体系自由化应在国家控制武力稳定及重建的前提下进行，这类呼声迅速高涨。其他地区的类似经验则显示，这种安全政治逻辑，要求付出社会政治代价，从长期角度来看，将阻碍政治开放进程。

民主化引发混乱

政治转型及民主化进程引发混乱，其原因是这二者改变了获取国家与政府资源的现行“游戏规则”。如果这种改变的发生，是人们未曾期待、未曾规划的，那么，尤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安全力量常常被赋予“裁判”角色或者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发生这类改变的背景，并不是国家陷入内战或者一方获得军事胜利，那么，国家安全力量的支持或反对，就尤其能决定下一步进程的发展。

一旦转型进程启动，那它也会影响安全力量。各种转型进程中，尤其是民主化进程会影响安全力量。民主政权的特点就是，国家安全力量由选出的代表来控制，法制国家工具确认武力的合法性。而大功告成之前，人们要走过一条遥远的道路，途中常常荆棘密布。Samuel Huntington（参见其作品1991: 587）早就指出，在民主化进程背景下，虽然军队放弃对政府的控制，但是军队不放弃对国家武力工具的控制。事实上，转型自身在不同层面带来混乱，部分情况下甚至也引发暴力活动，这种情形下，公共安全机构面临着难以克服的艰巨挑战。

政治转型进程，改变了人们对安全及混乱观念的理解。每个政府的中心任务就是确立最低限度的公共安全；但是，首先要为谁创造安全，如何实现这一点，通过谁来实现这一点，在这些方面就呈现出各种差异。在源自西方的民主法制国家模式下（人们至少常常委婉地将这一模式视为讨论的标准），确立安全就是国家安全领域的任务，这里对安全的理解就是：没有个人人身安全方面的威胁。但是，在西方工业社会中，国家武力垄断的具体形式，

也有所不同。比方说，在美国，私人可以拥有武器，这一点被载入宪法，而欧洲诸国对此却采取严格管制。南半球的国家社会，大多有数目众多的组织机构及行动力量，在不同层面并且为不同团体创建安全——或者它们也制造混乱。在南半球私人持有武器，这并不是新兴现象，它表明国家组建进程未能、或只是部分实现了武力工具垄断。分析政治转型以及不同形式的暴力之间的关系时，尤其要注意到这一点。

转型进程及武力

1974年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开始之际，亚非拉美以及中东的50多个国家也经历了转型，至少曾在一段时间内，它们成功建立了民主政权。¹ 如果人们将这些国家民主发展方面的数据，对照各项暴力指数（以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ject）为基础分析集体暴力），可以看到一幅充满矛盾的图像。人们可以将转型国家分为三类：

- 第一类转型国家，在转型前后未曾爆发有组织的集体暴力事件。这一小类成功“巩固”民主制度的国家，涵盖各种各样的国家地区，如佛得角共和国、智利、蒙古、台湾、乌拉圭。其中部分国家，被划分为民主国家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也有一些国家才刚刚跨过了民主制的门槛。
- 第二类国家，成功实现了民主化进程，实现过程中伴随着有组织的集体暴力活动。这类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南非共和国、萨尔瓦多等。此处可以提出的问题就是，是否加深转型就能制约暴力，是否能将引发暴力的矛盾，导入民间性轨道加以解决。至少在那些通过民主化结束内战的国家，比如萨尔瓦多或者危地马拉，人们期望能实现上述这两点。

1 “政体第四指数”（Polity-IV-Index）为政府打分，分数跨度为-10（世袭君主制）到+10分（稳固的民主制）。得分+6及以上的国家可以被称为民主国家，即使这些国家在一些领域还存在着不足（参见：<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最后查阅日期2013年5月31日）。一些国家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就已被该政体指数分析机构划分为民主政权，这些国家中，有三个国家遭受降级，它们是：1994年冈比亚，1982、2003及2010年斯里兰卡，2006年委内瑞拉。

- 第三类国家之中，民主化进程摇摆不定。这些国家在某段时间里，跨过了民主边界，但是然后又遭受倒退。在这些国家里，部分国家里出现了有组织的集体暴力活动，部分国家并不存在有组织性的集体暴力活动。

瓜就经历了类似的情形，1993年厄立特里亚独立后，2001年东帝汶独立后，都发生类似的情形。最近发生的事例就是2011年以来利比亚所经历的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安全力量受到民主监控。

表格1：政治转型及暴力（1975-2012年）

	民主化程度8-10	民主化程度6-7	民主化程度摇摆不定
民主化实现后，不存在有组织的集体暴力活动	乌拉圭、智利、佛得角共和国、蒙古、台湾、科摩罗群岛、尼加拉瓜、巴拿马、南朝鲜、阿根廷、巴拉圭、多米尼加共和国、（2001年以后的）加纳、圭亚那	贝宁、玻利维亚、塞拉利昂、东帝汶、马来西亚、纳米比亚、几内亚比索共和国、利比里亚	所罗门群岛、斐济、马拉维、莱索托、赞比亚、冈比亚、委内瑞拉
实行民主开放前后，出现有组织的暴力活动（依照“政体第四指数”：评分+6及以上，时间段为前后5年）	土耳其、南非共和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巴西、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墨西哥、肯尼亚	黎巴嫩、塞内加尔、马里共和国、布隆迪共和国	孟加拉、厄瓜多尔、海地、苏丹、斯里兰卡、秘鲁、马达加斯加、尼泊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尼日尔、泰国

表格来源：依照“政体第四指数”（指数中对得分为6至10之间的民主体系进行统计；得分为10，就已经可以称为是稳固的民主体系，得分为8、9分的国家也已经取得了根本性进步）和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战争、武装冲突、单方面暴力、非国家性暴力；参见：www.pcr.uu.se/research/UCDP/，最后查阅日期：2013年5月31日），作者自己得出的分析结果。

不仅民主化进程，而且暴力也都呈现出复杂性，所以，这二者之间，并没有简单的直线形关联，比如说民主化程度越高，并不意味着同时暴力减少，而这并不让人感到吃惊意外。具体谈到有组织的暴力以及政治转型进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必须至少要再考虑到三个因素：政治转型自身的模式、安全领域里已有机构的继续存在还是受到削弱、外界影响的形式及规模。

转型模式——约定展开合作或者与旧政府决裂

转型进程采取何种方式，昭示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其中也包括安全部门机构可能发生的变化。采用革命方式进行公开决裂，或者作为战争的结果而与以往决裂，至少在理论上带来了崭新开端的机会。反抗力量的原有成员，可以摇身一变，取代现有的安全力量，1979年尼加拉

如果旧政府与改革力量约定开展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获得的变动空间，要小于一个公开的决裂所带来的空间。如果国家安全力量是旧政权的核心组成部分或权力支柱（正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拉丁美洲的军政府，或者是埃及现在的情形），这些安全力量参与过渡期、或者甚至建设过渡期，这能让它维护自己的特权，部分情况下，甚至能通过新宪法对此做出保障。在这种情形之下，可能需要漫长时间，权力关系比例才能转移到对平民精英足够有利的局面，以实现根本性改变。智利直到2005年才修宪，以此减少军队的独立，然而早在1990年，智利第一任平民政府就已经上台。也就是说，军队作为“机构性稳定的保障者”，享受了15年的特权。这类情形下，安全政策方面的挑战，首要就是限制国家安全力量的高压活动，让其行为服从法制国家及民主监督机构的制约。因此，Luckham（参见其作品2003: 15）正确指出，转型进程中，与其说

重要的是“平民”进行监督，不如说重要的是对安全力量进行“民主”监控。

约定推行政治民主化，也可以由谈判达成，以此终结内战。大多数和平协议中包括战后秩序创建方面的条款，这些条款确定，是否有“民族团结”政府，是否有权力分享协议以及（或者）进行选举。此外，协议中还注明，如何对待原有的战斗人员，比如说是解除他们的武器，让他们复原，还是将他们整编到共有的武装力量中。这意味着对安全力量结构进行全面改革，而这首先会带来不安定。这方面的例子就包括所谓的“破坏者”的活动，这指的也就是那些在和平协议以及政权改变中的失败者，比如说复原的战斗人员或者前政府的士兵。这类团体的暴力活动，或者有着明确的政治动机，但也可能成为或多或少有组织性的犯罪现象，为转型带来问题。

国家安全机构——继续存在或者瓦解

与转型模式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应对不安全以及各种形式的暴力的能量如何，特别是在转型进程中，确保及维护国家武力垄断方面。政权发生变更，矛盾随之产生。比如说，民主化为那些迄今被摒弃在外的行动力量提供新机会，但是也改变了获取资源及权力的游戏规则。这一情形下，两大改变尤其危险，也就是：国家领土结构发生改变、引入选举（参见：Cederman、Hug、Krebs 2010）。决定采用何种选举体系（多数选举制还是比例选举制，地区还是全国候选人名单）并不纯粹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会极大影响地区及国家层面的精英力量对比。由此，中央政府以及个别地区之间关系上，可能会产生新的尖锐矛盾。例如，1999年后印度尼西亚实行民主开放，这让东帝汶乘机赢得了独立。与其相反，印尼的亚齐省也试图争取独立，却受到暴力镇压，其结果为2005年该省获得极大的自治权。

选举方面出现的暴力，也显示出社会权力结构发生改变。通过选举，那些迄今为止被摒弃在外或者被边缘化的群体，能参与到政治体系中来。因此，民主化进程初期，选举的结果极其难以预测。于是，有些人尝试在选举之前恐吓或者甚至谋杀政治竞争对手，以图影响选举结果。选举

中出现舞弊现象，或者选举结果差距不大，都会导致暴力发生。2007年肯尼亚爆发暴乱，还有2012/2013年埃及抗议活动中出现了部分暴力现象，都证明了这一点。

进行政治转型，与此同时内战结束，这尤其能让国家对暴力的控制能力部分瘫痪，因为此时问题重重叠加，并呈现几何式增长。民主化、维护和平或者巩固和平，这些要求都需要人们为其单独采取专门措施，并确定轻重缓急，但是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评估看法不同，这会导致纷争。此时国家丧失武力垄断，或者人们未将国家武力垄断视为合法，所以这类情形下，对安全领域进行改革势在必行，但同时，人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确立有效运作的机构。

外界干预

自冷战结束后，受到联合国委托的、未经联合国委托的外界行动力量，都加强了对纠纷的干预。以前干预的背景是东西方阵营之间的冲突，而现在进行干预的理由就是对平民的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以及终止暴力。在此情形下，两项联合国的使命，一方面就是监督停战协议，另一方面则是强迫遵守协议，这二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如今，不光联合国委任的使命，还有其他的干预行动，都变得更加“强硬”，不再仅仅包括联合国部队自卫权，也包括复杂的任务，比如承担警察职责。这方面的例子不光有东帝汶和波斯尼亚；在塞拉利昂共和国、阿富汗以及伊拉克这些国家，外界行动力量也承担了公共安全领域的职能（参见：Chesterman 2005: 99-125）。

无论干预强度如何，现在的标准常态就是：人们要求政府民主化，并为此提供支持。引入普遍、自由且公平的选举，让政府获得合法性，并能让外界行动力量退出干预活动。

政治转型过程中，维护或者重建安全力量方面的挑战，也相应可以按如下三大因素进行区分——过渡方式、国家安全机构的形式、外界行动力量扮演的角色：

- 通过谈判而进行转型进程（约定开展合作），并继续保持国家安全能量，受外界影响不大，这种情况下，人们面临的问题是传统问题，也就是对军队、警察进行平民与民主监督之间的问题。经验

显示，如果政治转型进程既未曾伴随政治暴力现象，亦未曾受到其他形式的暴力影响，那么，这种情况下，维护安全尤其容易取得成功。乌拉圭以及智利就是这类发展的代表。

- 如果武力冲突导致各方约定合作（比如以和平条约的方式出现），必须要重建国家力量，或者对现有的国家力量进行改革。外界行动力量在此就获得了一项重要功能，但是实际上，他们不能一直完成这一功能。“安全隐患”不仅威胁着前武装战斗人员，也威胁着全体人民。这里，警察力量建设以及（或者）

对警方进行改革，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 如果与上一届政府决裂，那就必须重建国家力量，重建过程中获得外界支持或者不受到外界支持。至少短期内会出现权力真空，那些所谓的“破坏者”（也就是反对转型的人），还有其他暴力活动力量（比如有组织的犯罪力量），就会利用这一真空。关键挑战就在于：无论是通过建设新的安全机构，还是通过外界行动力量提供安全保障的方式，要尽快克服真空状态。

表格2：暴力及国家高压措施

		跨过民主制门槛（“政体第四指数”中评分为+6及以上）的年份	跨过民主化门槛10年后国家高压措施规模（依据政治高压指数（PTS））
伴随暴力	巴西	1985 -	4/4
	萨尔瓦多	1984 -	3/3
	危地马拉	1996 -	4/4
	印度尼西亚	1999 -	3/4
	肯尼亚	2002 -	2/3 (2011年)
	墨西哥	1997 -	3/3
	菲律宾	1987 -	3/3
	南非共和国	1994 -	3/3
	土耳其	1983 -	4/5
不伴随暴力	佛得角共和国	1991 -	-/1
	智利	1989 -	2/2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96 -	2/3
	加纳	2001 -	2/3
	圭亚那	1992 -	2/2
	科摩罗	2004 -	-/2 (2011年)
	蒙古	1992 -	-/2
	尼加拉瓜	1990 -	2/2
	巴拿马	1989 -	-/2
	巴拉圭	1992 -	2/3
	南朝鲜	1988 -	2/2
	台湾	1992 -	1/1
	乌拉圭	1985 -	2/2

表格来源：“政体第四指数”及“政治高压指数”（<www.politicalterroryscale.org>），最后查阅日期：2013年5月31日）。政治高压指数，分析国际特赦组织发布的年度人权报告和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年度人权报告，将国家高压划分为1级（极其少见）到5级（高压现象普遍化），其中3级为大规模传播。

因此，所有转型进程中，势必要在公共安全领域进行国家安全机构的改革，但是，改革深度会有所不同。如果国家力量不强大，而外界支持力度不大，同时又出现各种形式的暴力现象，那么这种情况下，要克服挑战，最是举步维艰。

民主化、暴力及高压

安全部门的改革，旨在改变国家安全机构的行动准则框架，特别是要对国家机构进行法律约束以及民主监督。同时，也要改善其运作方式，提高效率，并提高中央机构（除了军队、警察之外，特别要提高司法方面的）合法性及认可度。总而言之，这些措施应促使确立合法机构。但是实际上，改革进程中，人们确定的优先事宜有所不同。

在此，不同形式的暴力并存，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这些机构自身还处于改革进程之中，它们如何应对安全政治挑战？如何制约暴力？

比较一下转型成功的国家（这些国家在“政体第四指数”中得分为8-10分，按照该指数的定义，这些国家正朝着稳定的民主制度迈进）的发展情况，就可以清晰看出，暴力及国家安全部门改革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如果转型进程伴随着暴力冲突，那么即使转型开始十年之后，与无暴力冲突的转型国家相比，这类国家的高压举措，规模明显更大。

即使不同研究证明，民主化进程中，要过一段时间，国家高压才会有所减少（参见：Davenport 2007），但十年的间隔也已经足够长了，有理由让人期待这方面有所进步。更为仔细地看一看相关国家的暴力类型，就可以看到，问题局面呈现出不同的状况，甚至有时候问题层层叠加：

- 如果内战背景下，推行以“选举民主”为发展目标的政治开放（比如萨尔瓦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土耳其），国家安全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获得特权，以继续作战。如果战争结束，就需要进行改革，以确保对军队实行平民及民主监督，确保能对军队自治权进行限制（比如限制军事裁判权、议会对军队财政预算监督）。

- 一些国家转型进程中出现权力真空或安全隐患，在这些国家，武装力量会扩散壮大，比如里约热内卢、危地马拉或者墨西哥的贫民区存在黑帮团体，他们是有组织犯罪活动的组成部分。但是，不同种类的冲突，比如具有相当强烈的种族因素的冲突，也可能升级，正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南非共和国的暴力冲突，或者当前肯尼亚的冲突，就都证明了这一点。对此国家采取镇压措施，主要出动军队，以暴制暴。这里面临的关键挑战，一方面是要重建或者巩固国家武力垄断地位，但另一方面也是要实现民主以及平民对安全力量的监督。

对待武力的方式，起着决定性作用

显然，与其说暴力影响着转型自身的走向，不如说暴力对国家安全力量的作用及行为起着影响，无论这种暴力是否首先是政治的（脱离国家独立，或者选举前后），抑或是有具有犯罪背景的。实际上，出现暴力时，要求稳定或者“强硬手段”的呼声，总是会高涨。公共安全与政治转型，被刻画成不可兼得的对立。

“阿拉伯春天”诸国现在经历的冲突，正显示出与此相关的问题局面（也就是与公共安全与政治转型相关的问题局面）。埃及与军队协定的过渡条款中隐藏着的危险就是：至少在较长时间内，军队会在政治转型进程中充当“仲裁者”一职。这样，权力对比发生转移；与平民以及有志于改革的行动力量相比，军队里的精英阶层就会赢得更大的影响或者能巩固自身的影响。与埃及不同，在突尼斯，军队明确声称自己政治中立。而利比亚面临的挑战，也是许多战后国家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就是：能垄断武力工具吗？如果可以，由谁来垄断？又如何对此进行民主监督并赋予合法性？缅甸结束五十年独裁统治后，由军方引入开放进程，而不同民族之间的暴力现象增长，这让开放进程也受到威胁。

如何对待暴力，对转型过程的进一步发展，处处能起到极大的影响作用。高压手段能迅速见效，但是需要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这让军事精英变得更加强大，这样就直接或间接促使暴力长期存在或者暴力升级。国家安全力量的高压行为，让其他行动力量有理由采取暴力行为，而人们

对法制国家工具处理冲突的信心，原本就不大，现在更是动摇了这一微弱的信心。

谈到如何对待暴力，为此发展出合适的战略这一方面，外界行动力量必须考虑到不同形式的暴力，而且也要考虑到其根源之所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冲突。

转型进程并非是直线前进的，它创造出胜利者及失败者。暴力加大了进程中原本就存在的不安定性。如果人们将公共安全以及民主化视作对立的双方，人们可以有针对性地运用暴力，来动摇改革或者破坏改革。人们常常优先考虑“安全”，将民主化往后推移。但是这种策略之中蕴含着危险，会制造更多暴力，将转型进程扼杀于萌芽状态。

址: <http://www.giga-hamburg.de/dl/download.php?d=/content/publikationen/pdf/gf_nahost_1304.pdf> (2013年5月31日)。

参考文献

- Cederman, Lars-Eric、Simon Hug 及 Lutz F. Krebs (2010), *Democratization and Civil War: Empirical Evidence* (民主化及内战：以经验为基础的证明), i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7, 4, 377–394.
- Chesterman, Simon (2005), *You, the People: The 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State-Building* (你们，人民：联合国、过渡期管理及国家构建),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1991), *How Countries Democratize* (国家如何民主化), i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6, 4, 579–616.
- Johnstad, Peter G. (2010), *Nonviolent Democratization: A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How Transition Mode and Violence Impact the Durability of Democracy* (非暴力民主化：对转型模式以及暴力影响民主持久性的敏感度分析), in: *Peace & Change*, 35, 3, 464–482.
- Luckham, Robin (2003), *Democratic Strategies for Security in Transition and Conflict* (转型及冲突之中安全领域的民主化战略), in: Gavin Cawthra 及 Ronin Luckham (编辑), *Governing Insecurity: Democratic Control of Military and Security Establishments in Transitional Democracies*, London, New York: Zed Books, 3–28.
- Mattes, Hanspeter (2013), *Schwierige Neupositionierung des Militärs in Tunesien, Ägypten und Libyen* (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军队艰难的重新定向), GIGA Focus Nahost, 4, 网

■ 作者简介

Sabine Kurtenbach博士是GIGA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的政治学家。她的研究对象是暴力诞生的原因及其动态发展，以及战后国家社会特殊问题局面。中美及安第斯国家是她重点研究的区域。

邮件地址：<sabine.kurtenbach@giga-hamburg.de>，网址：<<http://staff.en.giga-hamburg.de/kurtenbach>>

■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中，本专题的相关研究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内，“政治体系合法性及效率”一号科研重点，研究政治转型进程。“暴力及安全”二号科研重点的研究中心是政治暴力及内部安全，其中“暴力的形式以及公共（不）安全”科研小组研究其根源、动态发展、如何对待各种非组织性暴力冲突。“可持续和平组织”（ISP）这一联网合作项目研究对象是：机构成功长期巩固和平之条件（<www.giga-hamburg.de/isp>）。

■ 2013年《焦点》刊物重点主题

2013年上半年，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焦点》所属的全部五大系列刊物，从各自区域及全球视角出发，研究公共安全面临国内挑战这一背景下的军事主题，以及军队及平民关系当前变化。

■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中，本专题的相关出版物

Argueta, Otto, Sebastian Huhn, Sabine Kurtenbach 及 Peter Peetz (2011), *Blocked Democracies in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民主受阻), GIGA Focus International, English Edition, 5, online: <www.giga-hamburg.de/giga-focus/internation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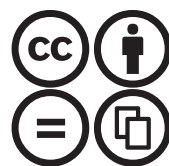
Basedau, Matthias 及 Sebastian Elischer (2012), *Auf dem Rückzug in die Kasernen? Autoritäre Herrschaft und das Militär im subsaharischen Afrika* (撤回到军营？独裁统治以及漠南非洲的军事), in: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Sonderheft 47: Autokratien im Vergleich*, 354–383.

Kurtenbach, Sabine (2011), *State-Building, War and Violence: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 (国家建构、战争及暴力：来自拉丁美洲的证明), GIGA Working Papers, 181, online: <www.giga-hamburg.de/workingpapers>.

Mattes, Hanspeter (2013), *Politische Transformation und Gewalt in Tunesien, Ägypten und Libyen seit 2011: Ein Forschungsaufsatz* (突尼斯、埃及、利比亚2011年以来的政治转型及暴力：研究概述), GIGA Working Papers, 219, online: <www.giga-hamburg.de/workingpapers>.



GIGA《焦点》刊物，为开放式发表刊物。您可以在网上免费阅读、下载，链接为<www.giga-hamburg.de/giga-focus>，并可依据“知识共享许可协议”中“姓名标示—禁止改作3.0”<<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3.0/de/deed.en>>的规定，自由复制、传播、展示作品。特别注意：正确注明该文首次发表于GIGA《焦点》刊物，不得更改、删节。



GIGA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 Leibniz-Institut für Globale und Regionale Studien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 – 莱布尼茨全球与区域研究所) 坐落于汉堡，是一家政治上独立的、非大学性的研究机构，就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中东、全球问题，出版《焦点》系列的各期月刊。编辑组讨论、甄选文章，文章的中、英文版发表于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焦点》刊物国际版。该系列刊物由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编辑、出版，非德国外交部刊物。选取的主题、作者所持的观点，并不代表德国联邦政府的官方立场。保留错误、遗漏的可能性。GIGA及其作者，对内容正确性、完整性、或使用本刊物提供信息而造成的后果，不承担负责。不使用女性专有人称、职位表达方式的原因，仅是为了方便阅读。

编辑：Robert Kappel；杂志系列总负责：Hanspeter Mattes、Stephan Rosiny

翻译：曹娟 (Cao Juan)；审校及排版：Christine Berg (山可婷)

联络：<giga-focus@giga-hamburg.de>；GIGA, Neuer Jungfernstieg 21, 20354 Hamburg, Germany 德国汉堡

G I G A Focus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Leibniz-Institut für Globale und Regionale Studien

出版说明